

王晓纯 吴晚云 主编

N

e

w

H

u

B

a

B

i

t

i

c

s

S

e

r

i

e

s

s

什么是当代

汪民安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no.19
新人文
丛书

什么是当代

汪民安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o.19
新人文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什么是当代 / 汪民安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2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1321-6

I. ①什… II. ①汪… III. ①启蒙运动-研究 ②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504 ②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858 号

什么是当代

汪民安 著

策划统筹: 陈卓

责任编辑: 周伟

责任印制: 韦航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版式设计: 周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18.25 彩插: 0.5

字数: 225千字

版次: 2014年2月第一版 2014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321-6

定价: 4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象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目 录

第一辑 启蒙及其之后	001
启蒙现代性	003
尼采论虚无主义和上帝之死	028
巴塔耶的神圣世界	053
福柯的总主题：如何塑造主体	082
阿甘本论赤裸生命和大屠杀	097
福柯、本雅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	106
第二辑 现代家政	121
如何想象动物	123
城市与植物	138
论垃圾	147
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	162
电视的观看之道	173
洗衣机与家务劳动的再生产	190

第三辑 图像与语言	203
作为收藏品的艺术作品.....	205
没有肖像的肖像画.....	211
绘画中的真理：从《血衣》到《父亲》.....	217
《乌比诺的维纳斯》中的手、动物和色情.....	233
艺术行为.....	241
双重相遇.....	259
友谊、沉默和语言.....	263
后 记	277

第一辑
启蒙及其之后



启蒙现代性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社会生活开始从神圣的超验领域退却了，它们越来越转向世俗的事务。纵向的天国逐渐被铲平，人们开始在地上横向地彼此观望。这种向俗务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这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一般被看作是启蒙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欧洲在16—18世纪展开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

在现代性的开端处，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站着的是政治性的诡计多端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第一个将他的理论抱负置放在务实的现实政治上来，同那些深究“理想国”的古人不同，他不是幻想的，而是“短视”的，他将目光下降到地面的实际国度，只关心具体的现实统治技术。由于君主和君权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并没有一根完全合法的纽带，君主可以巧妙地获取君权，也可以莫名其妙地失落君权，那么，君主保持和维护其君权，就需要计谋和手段。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是，君主借用什么样的手段保持他的君权？君主如何施展他的权力技术？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因为其现实性和务实性，因为其对手段和技术的兴趣，古代政治学的抱负，即对最佳政制的臆想，被放弃了。在古人那里，德性是最高目的，政制屈从于德性，最好的政制就是要有利于德性的实践。

这样的政制的获取靠机缘。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政制应以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其禀性是善——为基础，它应该在自然本性上滋生出来。但这个自然本性——善——不是意志和激情，它独立于甚至是背离人的意志和激情，它是一套自然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尺度。这个自然秩序是神性的，而且尽善尽美。正是这个先在的法则，提供了政制的合法性秩序，善和德性位于它的核心。个人的权利、激情和欲望应该在这个秩序中收敛起来。但马基雅维利颠倒了这个成见：政制和统治是最高目的，德性屈从于政制，政制的实践可以将德性弃置一边。这样的政制靠技术可以获致，因此，人的自然本性并不是它的基础，并没有一个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理想国，倒是人的意志在操纵政治社会。这样，国家统治技术，成为压倒性的头等大事。德性目的，以及要实现这个德性目的的理想国就被推到了后台。马基雅维利针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如何统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幻想的应当如何的国家。同时，他所讨论的是“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①在他这里，“政治社会便绝非自然的，国家只是一件人工制品，应当归因于习俗。”^②

对现实的强调，对技术和手段的着迷，政制对于德性的垄断，自然意志对自然秩序的压倒性胜利，将政治行为作为一个世俗自治的区域，而不是神学的分支来对待，尤其是，“不提任何关于人在自然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中的位置的学说”，而且“没有对上帝和神律的严肃假设”。^③如此种种，同古人的（无论是希腊、罗马传统还是《圣经》传统）有关政制和统治学说的差异，使列奥·施特劳斯将马基雅维利视为现代性的开端。伯林在另一种意义上看待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他恰好也以这一主张著称：各种目标和各种价值同样神圣，同样终极，但却可以相互悖论，并且永远无法调和。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拉回到世俗的技术性事务中，他的决定性开端颠倒了古代的自然和政制的关系：政制并非是按照自然法的内在要求顺利地生

^①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转引自译者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列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见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第92页。

^③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4-45页。

长出来，人并非被动地安然于其内在的等级秩序之中。现在不是听天由命的时候了，相反，意志可以主动选择政制。但是，霍布斯还是强调了政制和自然法的密切联系，政制应该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生长出来。这看上去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否定，但，霍布斯却通过重新解释自然法的概念，推进了马基雅维利——自然法在霍布斯这里，其要点不是超验的善的自然本性，不是规范性的准则，不是对人有约束力的秩序，不是一个客观的尺度，而是人的自保本能、欲望和意志，最终，自然法被改写为人的自然权利。政制应该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符合自然权利的要求，而不是符合德性和正义这古代的最高自然要求。与身体相关的自然权利取代了超验的善、正义和德性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和标准。在古代，自然权利因为德性的最高目的受到制约，在霍布斯这里，自然权利作为自然法制约了德性。权利历史性地突破了先前自然秩序的障碍，而获得绝对的膨胀的自主，并使政治社会盘绕着它而展开。

在此，我们发现了日后自由主义的曙光：欲望和激情猛然冲破了秩序的闸门，政治秩序不是在管制它们，恰好相反，是它们创造了政治秩序。政制不再臣服于以德性为根基的自然，相反，它应该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生长。霍布斯的经验主义使他将人看作是自然，这个自然不再是神圣的秩序，而是感官主义的，是身体性的冲动。具体地说，自然的欲望主宰着个体，它是人的行为根基，理性不过是欲望的副产品，它是欲望和激情爆发时的奴隶性工具。这个欲望强劲有力，永不中断。“没有欲望，就会死。”既然每个人都被这种一点都不安静的冲动欲望所宰制，那么，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欲望之间的碰撞关系，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无限制的暴力、没完没了的敌意、时时刻刻的恐怖和恫吓，这就是霍布斯描述的残酷的临战般的自然状态。显然，这个非社会性的自然状态对个人的自保权利构成威胁，因此，一个强大而绝对的君主应该通过契约的方式被选中。根据契约，人们必须放弃自律权，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人间上帝的统治。个人都收敛起自己进攻性的自然欲望，不过是为了让自我保存的欲望得以维持。国家就是在自然的个人之间起着沟通性的媒介作用，从而让自然状态衍生为社会组织。个体之所以让渡给君主那么大的权利，

不过是为了让君主瞪大眼睛为自己看守和护卫着自保权利。自保，这个基础性的自然权利，在霍布斯那里，毫不曲折地通向了独裁式的绝对君主制。

但是，在洛克那里，以自然权利为基础，自由主义政制开始兴起。洛克的自然状态比霍布斯要温和和理性得多，人群并非狼群，因此，根据契约达成的政府形式并不张牙舞爪。自然权利的内容，在霍布斯那里是自我保存，在洛克那里则变成了财产权。霍布斯为了保障自然权利，呼唤出一个超验般的现代君主，洛克为了保障自然权利（财产），却是让这个法力无边的君主退位，并呼唤出一个并不飞扬跋扈的现代国家形式：“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①无论是洛克的政府，还是霍布斯的君主，都被设想成为对自然权利的保护。但，洛克的政府为什么力图取代霍布斯的君主？在洛克看来，霍布斯的君主可以对臣民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但无限制的君主和臣民的纠纷却没有仲裁者，他们的关系仍旧是自然状态的关系。因此，绝对君主应该让位于议会主权，政府权力不能法力无边，它应该被收敛和限制，绝对权力应该被分化并彼此制衡。洛克的主张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作了注释，在洛克这里，分权制的现代政府的雏形开始形成，经过孟德斯鸠的阐释性过渡，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付诸实践，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国家形式开始建立起来。

国家是技术性的人工制品，而非天然的秩序性法则；国家是人间的社会契约，而非上帝的天意；国家是自然权利和意志的保障，而非对它的限制性否定；国家应该是有限权力，而非绝对王权。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再到洛克，现代国家的概念逐渐形成：这是一个世俗的被谋划的国家，它是个人的自愿联合体，国家的动源性根基是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其合法性是同意性的契约。这就是17世纪开始形成的国家的概念，其核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和尊重，个人作为最高价值受到国家的尊重，个人及其权利是社会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原则的根基。现在，人内在的自然本性，而非外在的秩序性的道德标准，成为自由主义的磐石。如果说，自

^①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7页。

由主义理论和实践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内在于自由主义的自然本性的世俗泛滥，就是各种私欲和意志被赋予了正当权利，就是将权利凌驾于善和正义之上，就是将个人价值凌驾于整体价值之上。而这，终将引发一盘散沙的虚无主义，现代性的动荡危机由此而生。

自由主义对个人及其权利的强调，不过是时代气质在政治领域的回音。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狭隘的意义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16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潮流中遥相呼应，二者具有相似的历史气质：国家理性呼应经济理性；自然权利的私欲呼应利益冲动的私欲；权利的个人主义呼应商业的个人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难解难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前后相接，但还是可以大概地，也只能是大概地说，作为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其根源驻扎在宗教改革中，作为政治形态的自由主义，其最早的观念根源出自文艺复兴。

因此，马基雅维利作为开端，就毫不奇怪了。他被文艺复兴的氛围所包围。事实上，在他之前的一两个世纪，人就以回到古代的名义而重新在欧洲的版图上出现。按照布克哈特的说法，文艺复兴就是人文主义，其特点就是发现人和发现自然。人将目光低垂到自身置于其中的此岸世界，并对自身的潜力和理性进行探索。这已经不是退隐和沉默之人了，人不应该被抑制，不应该“把谦卑、克制和轻视世俗事务当做人类的最高品德”^①。相反，人的内在性、力量和潜能应被唤醒、被发现、被恰当地培养和发展。奥古斯丁将人看作堕落的生物，他要克制，要上帝的拯救，要为来世而祭献现世，总之，要泯灭“人性”。但人文主义者却相信人的尊严和优越，荣誉和声名成为人的目的，追求技艺和完美的人格是基本的生活态度。人，以其复杂的内心奥秘和现世荣光得以表达。同时，自然而非天国，成为了好奇心最主要的场所，但丁率先发现了现世的人性秘密，彼特拉克则发现了现世的自然之美，在达·芬奇那里，自然的秘密和人的秘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对人体的精确描绘。对丰满而完整的人性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

^①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页。

“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①。人们力图将自己培养成多才多艺的艺术品。在这样一个“人的发现”传统的末端，是16、17世纪过渡期间的莎士比亚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想！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他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能上多么像一个天神！”人终于站在了宇宙的中心，自然和天神现在被人来衡量。

欧洲的文艺复兴将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人们慢慢相信，是人而非天意在书写历史，历史是人类竞争的产品。人文主义者对此世的热情虽然不排斥信仰，但决不被信仰所笼罩。他们热衷于竞争好动而不是沉思冥想。世俗的丰功伟业斩断了和天国的牵连。马基雅维利置身于这样的氛围和传统中，将这种观点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尽管不免残酷，但人可以通过手段和技术达成自己的目标，人能够主宰历史、主宰政治事务，人能够充满快感地实践权力的游戏。如果说人文主义既发现了人，也发现了人的尊严，那么，就前者而言，马基雅维利是人文主义的忠实产品，就后者而言，他走得过于极端以至于成为了人文主义的敌人。因此，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充满悖论的人文主义，即一种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这里的核心是，人充斥着巨大的自主力量，并有能力处在历史的中心。政制是人工制品，它的观念性根源则是人的发现，是人的自主性的前所未有的增强。但是，这个人工的政制产品服务于君主，而并不服务于政制下的个人，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反人文主义的，也是反自由主义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人开始获得自身的景观、厚度和物资性。在意大利，虽然不信教的风气开始蔓延，但人们还是试图在激情和信仰之间获得容纳性的平衡。人们推崇希腊和罗马，但并不狂暴地攻击教会；人们反感教会，但并不根绝圣典意识；人们纵情欢乐，但并不蔑视表面的宗教习惯。^②人们对于教会的愤怒留给了德意志，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接踵而来，将教会作为靶子，并将人文主义因素灌输到一般民众心中。宗教改革奠定了《圣经》的主导和起源性地位，但同文艺复兴一样，也开启了新的个人

^①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02页。

^②同上，第448页。

主义。在此，个人虽然仍是和上帝交流的个人，但毕竟是不再臣服于某一中介组织的个人，不再是被律条和标准束缚起来的个人，不再是负荷累累顾虑重重的个人，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性理解。人，在宗教意识中，依然能嗅到自由的气息，能嗅到尘世的气息，人们在尘世中的操劳并不动摇其对上帝的信仰，或者说，尘世中的操劳就是为了获救。但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还是存在着神学方面的分歧：对伊拉斯谟这样的人文主义者而言，对人性的肯定、人的日渐自信、意志的自主，不可避免地会暗中削弱（尽管不是强烈地抵制）人生而堕落的教义。但对路德而言，这断然不行，人还是充满着原罪，需要上帝的救赎，在尘世中的行事，无论如何不能侵蚀《圣经》的权威，在上帝面前越是谦卑，在尘世中越是苦行劳作，得救的机会就越大。人文主义者在悄悄地淡化信仰却不猛烈攻击天主教会，新教徒猛烈攻击天主教会但丝毫不淡化信仰；人文主义者是因为淡化信仰而置身于尘世，新教徒是因为解除了教会的束缚而置身于尘世。显然，新教徒和人文主义者并不相容，但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携手并进——他们的脚步都踏进了世俗生活的旋涡中。这是现代性在16世纪的两个具有革命性的叙事性起源，尘世和个人一并成为它们的关注点。只不过，文艺复兴对于个人的诉求是以肯定的方式诉诸古代，宗教改革则是以否定教会的方式诉诸福音。人文主义者是以娱乐的方式在尘世中保持个体的自尊，清教徒则以苦行的方式在尘世中保持个体的信仰。二者都是对中古的拒絶式偏离，但人文主义者是要跨过它重返它的史前时期，新教徒是要摆脱它创造一个新的将来。享乐而自尊的人文主义者从思想和政治上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劳作而苦行的新教徒从经济和生产上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先驱。

个人，就这样被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不约而同地从历史的雾霭中推出。教会权威、教会事务，无论是其神学意愿还是其圣礼手续，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抵制和打击。在扳倒了教会的垄断般的石头的同时，经院神学的知识性权威也随之摇摇欲坠。现代科学，就成长于这个动荡时刻，从哥白尼开始，科学向教义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到最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推进，人们发现，物体和物体之间彼此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正是据此，它们可以自行运转，而并不需要外在推力，运动并